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4.06.008

文学作品中的“异质形象”与“镜像自我”

——以何塞的《珊瑚藤》为例

孙建光^{1,2}

(1.淮阴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淮安 223001;2.莱西姆大学 研究生院,菲律宾 卡威迪 4107)

摘要:文学作品中的“异质形象”描写可以满足读者对异域情调的猎奇心理,也是作者以“异质形象”镜像自我的有效手段。当代菲律宾作家F·西奥尼尔·何塞的《珊瑚藤》就是其中之一。何塞借助作品中不同人物的不同视角审视“异质形象”,镜像菲律宾民族的“自我”,对菲律宾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为读者呈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菲律宾社会全景式图景。

关键词:何塞;《珊瑚藤》;异质形象;镜像自我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4)06-0060-07

《珊瑚藤》(Cadena De Amor)是当代菲律宾作家F·西奥尼尔·何塞(F. Sionil Jose, 1924—2022)的一则中篇小说,与《白金》《迷恋》一起编入其中篇小说集《三个菲律宾女人》(Three Filipino Women, 1999)。何塞被誉为极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菲律宾作家,他以历史性的叙事方式,通过对细节的选择、精准的运用、精心的安排,对情节的巧妙处理,对象征、讽刺和恰当的对话等表现手法的娴熟运用,以及对问题道德敏感度的高超驾驭,为读者讲述真实可信的女性故事。《珊瑚藤》的女主角纳瑞塔是一个从圣安娜偏远乡村走出来的女孩,命运的安排让她成为参议员雷耶斯的儿媳妇。在参议员雷耶斯的精心栽培下,她逐渐成长为一位叱咤风云的政坛新秀。然而不幸的婚姻令纳瑞塔心力交瘁,一步一步地把她推入罪恶的漩涡。凭借她公公在议会的政治地位以及所交往男性的帮助,纳瑞塔积累了丰富的政治资本和巨额财富。她是位有政治抱负的女性,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菲律宾的政治生态、摆脱美国的后殖民影响、改善民生,但是终究未能逃出宿命的安排。何塞以《珊瑚藤》为题命名纳瑞

塔的故事,有着深刻的含义。珊瑚藤花形娇艳柔媚,花繁且具微香,纳瑞塔貌美如花,性格开朗,有思想,善决断,亦如珊瑚藤花一样艳丽明媚,代表着菲律宾新女性形象。何塞借助作品中不同人物的不同视角审视“异质形象”,镜像菲律宾民族的“自我”,深刻反思20世纪五六十年代菲律宾政治、经济、社会、民生等各种社会问题,表现出他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

一 异质形象与自我镜像

文学作品中“他者”形象的描写是文学创作的重要表现形式。在文学创作中,作者会根据叙事或者故事情节发展需要,依据自身的经历或者间接经历甚至凭空想象对异邦风情进行描写。事实上,“西方不少文学作品的作者本人很少到过‘异族’之地,很多时候是靠他人的描述或者自我想象创造出一些‘原始的’‘异国情调的’‘东方的’异族元素来迎合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满足西方读者对‘异国情调的’猎奇心理”^①。东方文学同样会在作品中描写西方社会或者比自己国家强大、发达的东方大国,镜像本族形象,反思本

收稿日期:2023-07-30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应用研究精品工程外语类重点课题(23SWA-01);淮阴工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2HGS001)

作者简介:孙建光(1975—),江苏淮阴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译介学、比较文学研究。

①孙建光:《〈尤利西斯〉中“他者”形象翻译分析》,《语言教育》2018年第2期。

我,进行文化与文明的交流与互鉴。“这是一种对人的社会存在状态的一种特殊反思。”^①无论是西方文学还是东方文学,对异族形象的描写,都会发生变异现象,主要表现为对异族形象的向往或者贬低。如果用主客体两极关系确立“形象”的价值功能,我们可以用保罗·利科提出的两个概念——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来分析文学作品中的异质形象功能。作者用意识形态的价值功能审视他者,往往是站在本族文化中心角度俯视“他者”文化,把“他者”看成是低贱的、野蛮的、未开化的来凸显本族文化的优越性,这时本族文化是高高在上的,有益于促进自我认同、民族认同;相反,如果作者用“乌托邦”价值功能,说明作者向往异族价值观,渴望本族拥有与异族同样的价值观,可能导致“自我”离异、民心涣散、社会崩溃,进而迷失自我。作者透过“异国形象”或者“异国描述”所呈现的“异国”内涵,不是认识论上的“真实复制”,也不是毫无根据的虚构臆想,而是游离于“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之间。文化中的“异质形象”描写可以映射自我,形成“镜像效应”。福柯以镜子为例,认为镜外是一个真实的世界,镜内是一个非真实的世界,人们通过镜中非真实的世界观察自己所处的真实世界,使得观者所处的地方既“绝对真实”,又“绝对不真实”^②。正是通过与镜像不断地对照,映射自我,促进人的主体意识不断加强,“逐渐获得自我认证和自我确立”^③。库利认为“人们彼此都是一面镜子映照着对方”^④。因此,对文学作品中的异质形象分析,有利于挖掘文学作品中作者的价值取向,探索作者的写作意图。文学中的异质形象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爱德华·萨义德指出,西方把东方形象描写成“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不正常的”^⑤,这并非真实的东方形象,而是扭曲变异的东方形象。作者对异族形象的描写,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用意识形态或者“乌托邦”的价值功能评判他者或者本我。中国学者叶维廉也认识到东西方文学各有一套自己的“模子”,不同“模子”之间存在差

异^⑥,因此在不同文化交融过程中必然会对异质文化进行扭曲。

二 《珊瑚藤》中的“西方国家”异质形象及价值取向

美国作为二战的战胜国,战后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强国,自我标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灯塔”,因此成为东欧及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民众向往的国度。在全球充斥着对“民主”国家美好向往的氛围下,不乏一些冷静审视现实的“他者”,他们或是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或是通过作品中的人物视角,叙述着与美国人相处后的切身感受。事实上,美国人与其他国家的人一样,有其善之本性,有其无知盲从的自信,更有上层精英阶层的虚伪与追名逐利的恶性。通过《珊瑚藤》中主要人物的视角来审视西方国家的异质形象,读者能更加深刻地理解东方小国民众是如何描述和阐释被视为“高人一等”的西方国家的异质形象,镜像自我,反向映射本我。

(一) 美国人的“他者”形象

众所周知,美国人一直生活在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之中,长期的优越感加上精英阶层的鼓吹,使得不少民众变得更加无知盲从,人性的淳朴和奸诈在形形色色的人中或隐或现。何塞在《珊瑚藤》用“东方国家”的视角审视美国人,既有意识形态价值功能,又有乌托邦价值功能,两者没有界限,处于一种模糊的若隐若现的态势。他们对美国人有自己的看法,普通美国人和自己一样,可以成为朋友,政客并不一定是优秀的、高人一等的。何塞在《珊瑚藤》中通过不同人的视角来审视美国人,给读者呈现了一个相对全面的美国人形象,普通人一样有虚荣心、对情感和性的追求。例如:“……你得在女孩身上花点儿钱的,请她出去共进晚餐,花钱给她买些糖果、巧克力啥的。不做好这些前戏预备工作,大多数的美国女孩是不会跟你那个的。”^⑦主人公埃迪和纳瑞塔谈起自己与美国女孩的交往,认为要想得到女孩芳心,哄好女

①项静姝:《异托邦与异质形象:〈上海幻梦〉中的他者空间》,《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②M.福柯,王喆译:《另类空间》,《世界哲学》2006年第6期。

③邓启耀:《我看与他观——在镜像自我与他性间探问》,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④查尔斯·霍顿·库利:《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包凡一、王源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18页。

⑤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9页。

⑥温儒敏:《中西比较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4—32页。

⑦F. Sionil Jose. *Three Filipino Women*. Manila: Solidaridad Publishing House, 1999, pp.34-35.

孩是必要的。显然,在埃迪眼中,美国人也不是高不可攀,与普通菲律宾人无异,一样地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一样吃喝玩乐。此时的菲律宾人和美国人是一样的,美国女孩并没有因为埃迪是菲律宾人而拒绝和他交往,甚至发生性关系。这时的埃迪完全可以以一种平视或者大男子主义的姿态和美国女子交往。他无需顾忌“白人至上”的欧美中心主义,此时的“东方主义”和“西方主义”平等融洽。但是,不同人眼中的美国人也是不一样的,这与审视者的观察点、兴趣,特别是内在的文化基因有着非常大的关系。多明戈·瓜迪亚眼中的美国女性是:

嗯,在纳瑞塔之前,大使也有过几个女人。其中一个为纽约姑娘,很有她自己的一套,然而你知道美国女人是什么样子的——她们压根儿就没有了点儿女人味。^①

伊图拉尔德大使的私人秘书多明戈·瓜迪亚眼中的美国女性是没有女人味的。他对大使的美国情人如是评价:“特立独行”“很有一套”“没有丁点儿女人味”。显然,多明戈对美国女性并不是很认同,至少和他心目中的女神纳瑞塔相比,美国女人缺乏东方女性的女人味。他认为纳瑞塔是菲律宾第一位具有国际范儿的女性,她的美貌、智慧、朋友圈、优雅的举止成就了她的成功。显然,作者在创造异族形象时不是靠自己的单纯想象,而是“通过作家本人所属社会和群体的想象描绘出来的”^②。倘若作者没有强烈的本族中心主义或者某种意识形态,或者深受本民族的“社会集体想象”的影响,他描绘出来的异族群像应该是各具特点,真实可观,而不是千篇一律地异化他者形象。何塞对异族形象的描写明显超脱了“社会集体想象”的僵化思维,为读者呈现了多元的异族形象。何塞作品中的美国人形象,让读者感觉如此之真,仿佛置身作品之中,有着亲临现场般的感受,因为他摆脱了“社会集体想象”的束缚,为读者呈现性格鲜明的异族形象,实现“异族形象”创作的突破。纳瑞塔与埃迪、多明戈等接触的群体不同,她的视角也为读者提供了不一样的美国人形象:

跟美国人,可以做好朋友,然而他们似乎非常地浅薄无知,他们观察这社会的眼界,真的是太狭窄了。他们对社会的看法不是来源于自己的亲身体验,而是媒体灌输给他们的。他们和我们做事风格不一样,他们缺乏直觉力,没有激情,在他们看来,物就是物而已。^③

纳瑞塔对美国人的评价在某种意义上更具现实意义。她对美国人的认知更加深刻,也更能体现东方主义的某种群体想象。她认为和美国人可以成为好朋友,但是他们浅薄无知,目光狭隘,易接受媒体的宣传灌输,缺乏正确、全面的判断力,他们做事风格呆板,不会变通,缺乏激情。显然作者是借纳瑞塔之口描述美国人的异质形象。这一异质形象亦或是他的自我想象,抑或是他通过和美国人的交往形成的评价。从形象学理论视角分析,东方人对美国人的“集体想象”更多的是美国人的“救赎”和“自我幻想”。纳瑞塔对美国人的形象描写显然缺乏一定的“社会集体想象”,更多的是与美国人打过交道的部分群体对美国人形成的一种群体想象。

(二)美国政治运行的异质形象

美国在成为世界强国之后一直利用各种手段“推销”其“民主模式”。菲律宾被美国殖民近五十年,其民众,特别是政治精英深受美国影响。很多精英都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因此在政治上倾向美国所谓的“民主模式”。《珊瑚藤》中男主人公埃迪和女主人公纳瑞塔都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或者硕士学位,对美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运行有着自己的理解与认知。

在美国度过的这五年里,我熟悉了纽约和华盛顿的权力运作机制。所有那些重要的人物:参众两院的议员、筹款委员会的成员、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成员,我全部都熟悉,都是我的熟人。还有他们的助手,我提醒你,永远别忘记助手。这就是为什么大使经常依赖我、要我给他出主意的原因所在。……只要我们还是美国的殖民地,我们就应该熟悉我们殖民主子的那一套运作机制。兄弟,这

①F. Sionil Jose. *Three Filipino Women*. Manila: Solidaridad Publishing House, 1999, p.41.

②刘洪涛:《对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几点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③F. Sionil Jose. *Three Filipino Women*. Manila: Solidaridad Publishing House, 1999, p.36.

就是我们的政治体制的源头所在。^①

纳瑞塔在和埃迪谈论自己回国后的政治抱负时,对美国的政治运行机制进行了描述。“只要我们国家还是美国的殖民地,我们就应该熟悉我们殖民主子的那一套运作机制”,从纳瑞塔的话语可以看出,纳瑞塔深谙自己国家的政治运行机制,源头来自美国。她对美国政治操作非常熟悉,加上她公公参议长雷耶斯的政治根基,她从政一定会顺风顺水。但是菲律宾国内的政治运行并没有美国那么顺畅,政治腐败,尔虞我诈,她渴望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实现政治服务民众。显然,她对菲律宾的政治本质没有深刻的认知,也无法寻找到政治失能的根本原因。

(三) 美国社会的异质形象

不少美国殖民地国家独立后,曾一度效仿或者照搬美国的社会治理模式。这和美国的民主制度模式在其刚建国时运行较为顺畅有着密切关系。起初,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轮流执政,促进了美国政治、经济、社会的极大发展。《美国独立宣言》开头就宣称人生来平等,成为发展中国家竞相向往的国度。毫无疑问,美国凭借其在科技、经济、军事等方面的霸主地位,加上媒体的鼓吹,给世界描绘了一幅乌托邦图景。全球不少民众对美国心怀憧憬,觉得美国一切都是好的,哪怕是获得美国一纸文凭也是莫大的荣耀。男主人公埃迪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他认为:“尽管如此,拥有美国博士学位总给人带来一种特殊的光环,所以我们必须为此付出代价。”^②显然获得美国博士学位,让他有种特殊的荣耀感。为了得到这一份荣耀,他愿意付出一切。大使秘书多明戈对美国充满向往,同时也充满复杂的矛盾心理:

想想看吧,她的两个孩子都是在美国出生的美国公民。我希望我也能有这样的便利条件。^③

多明戈非常羡慕纳瑞塔的两个孩子都是在美国出生,顺理成章地就成为了美国公民,内心也希望自己能有这样的便利条件。成为美国人是多明戈的一种奢望,这也是不少第三世界国家民众的普遍心理,在某种程度上是群体想象。媒体的鼓吹,“民主灯塔”的照耀,确实让不少人对美国充满向

往。事实是什么样子呢?恐怕也只有身在美国或者有过美国生活经历的人才有发言权。他接着对美国有着这样的评论:“然而美国不适合老年人,不是老年人的乐土。”^③这句话或许也能映射出作者对美国的看法。美国的老年人或许不能享受东方老年人的天伦之乐,孤独、无助、老无所依,这或许是“民主灯塔”送给他们最后的“民主”礼物。

三 《珊瑚藤》中的“东方国家”异质形象及价值取向

东方国家中,对菲律宾影响比较大的有中国和日本。菲律宾人对中日两国的看法和时代有着密切的关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伟大的革命胜利,令世界瞩目。毛泽东思想对东南亚国家有着巨大的影响,出现了不少“毛泽东主义”政党或者共产党,何塞的文学创作有着明显的时代烙印。

(一) 菲律宾人眼中的东方国家异质形象

小说中,作者通过埃迪、纳瑞塔、库尼奥上校等谈及了中国的菜肴、军人的革命精神、中国文化,以及日本的本性和印刷技术。寥寥数语影射出对东方国家“异质形象”的价值取向。退役军人安东尼奥·库尼奥上校参加过朝鲜战争,他描述了和中国军队战斗的情景,中国军人不畏牺牲、英勇奋战的精神和意志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事实上,那是一次撤退行动,因为中国军队一浪接一浪、一波又一波地向我们袭来,而我带领我的连队采用钳形攻势进行战斗。我方在这场遭遇战中五名战士阵亡。中国军人距离我们太近了,我们只好和他们拼刺刀。我们没有进行肉搏战,而是一直在向他们投掷手榴弹。自动步枪的枪管都因为连续射击,而变得滚烫,但他们仍旧吹着军号,向我们冲过来。^④

撤退过程中,菲律宾军队被中国军队追击,他们的武器优于中国军队,但是中国军人不畏牺牲,迎着他们的子弹,吹响冲锋号,奋勇追击,拼刺刀,肉搏战。这场战斗给安东尼奥·库尼奥留下了刻

①F. Sionil Jose. *Three Filipino Women*. Manila: Solidaridad Publishing House, 1999, p.38.

②F. Sionil Jose. *Three Filipino Women*. Manila: Solidaridad Publishing House, 1999, p.30.

③F. Sionil Jose. *Three Filipino Women*. Manila: Solidaridad Publishing House, 1999, pp.42-43.

④F. Sionil Jose. *Three Filipino Women*. Manila: Solidaridad Publishing House, 1999, p.24.

骨铭心的印记,他言语之中透露出对中国军人英雄气概的敬畏。

纳瑞塔对菲中关系有着自己的考量。这些考量能够反映那个时代菲律宾的部分政治精英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持有的积极开放态度,期望能够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如纳瑞塔说:

在外交事务方面,我想把我们和日本,和中国的关系分析得更透彻。我们应该立即承认中国,同中国建交。我告诉杰克——^①

纳瑞塔认为菲律宾和美国都应该承认中国,并且还把自己的观点告诉杰克(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她认为应该把和中国、日本的关系理清楚。这说明,在那个时代,菲律宾政治精英期望和东方大国建立外交关系。虽然那时的中国没有今天的影响力,而且第三世界国家受美国的影响又是深远而巨大的,但是他们已然敏锐地感觉到东方巨龙必然会苏醒,最终回归其应有的世界位置。

(二) 美国人眼中的东方国家异质形象

文学创作中作者会通过多元的叙事视角来进行“异质形象”的塑造,可以从本族人视角审视“异质形象”,也可以通过转述异族人的话语塑造异族的他者形象。在《珊瑚藤》中,作者借纳瑞塔之口谈及美国人对新中国的态度。部分美国政治精英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持一种积极态度。例如:

“当然是肯尼迪啦。当他还是参议员时,他就认为美国不和中国建交是不对的。中国不像苏联那样,中国不是美国的威胁,日本倒将会是个威胁。日本对我们来说是实实在在的真正威胁,而我们那些该死的政客和商人们却在出卖我们,把我们拖下水。”^②

从纳瑞塔的口口我们可知,当时还是参议员的肯尼迪对如何处理中美关系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中国不是美国的威胁,苏联和日本倒是美国的威胁;他认为是该死的政客、见利忘义的商人们把美国民众拖入政治对立。何塞通过纳瑞塔之口转述了肯尼迪对新中国的态度,表明当时部分美国精英阶层对中国持有积极的态度,他们希望与中国发展

友好的外交关系。这说明当时美国人对中国形象不全是负面或者是排斥的,特别是一些精英阶层渴望和中国建立积极联系,甚至外交关系。

四 “镜像自我”的价值思考

(一) 反思菲律宾自我民族形象

不同人物视角对美国及东方国家中国和日本的异族形象描述,最终需要镜像自己,检视本民族。小说对美国普通女性形象进行了描写:缺乏女人味,和大多数女性一样追求情趣和性趣,纳瑞塔和美国女人一样,感情放纵,或许是因为她是一个来自边远的外省乡村女子,她需要付出的代价更多。从开始的性压抑,直到丈夫去世,她遇到了库尼奥上校,终于第一次感受到做女人的幸福。从此性成为她俘虏男人的手段,成为她一步一步迈向人生巅峰的资本。毫无疑问,无论是作者还是作品中的人物,都视纳瑞塔为菲律宾新女性,她具有的智慧、胆识、美貌都是菲律宾人心目中集体想象的最佳形象。纳瑞塔回国后确实深受民众喜爱,一步一步向政坛的高峰迈进。多明戈的一段话或许能代表作者对菲律宾自我民族的期望:

她是我见过最美的尤物,比美国小姐或世界小姐都要漂亮。任何的社交场合,只要纳瑞塔一到,谈话都会停下来,大家都不说话,生怕分散了自己看绝色美人的注意力。大家就想看着她,看着她那双美丽的眼睛,诱人的双唇,美到无可挑剔的鼻子。哦,我沉醉在她的美貌中,忘乎所以。看到美女,我的反应一贯如此。^③

多明戈赞美纳瑞塔,认为她是世间“最美的尤物,比美国小姐或世界小姐都要漂亮”,或许这时菲律宾人终于找到了自信,他们同样拥有媲美美国甚至世界的美女。通过和美国女子的比较,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便菲律宾还是第三世界国家,亦无需妄自菲薄,他们同样有优秀的人才,不乏有思想、有抱负、心怀民众的政治人物和政界美女。这些恰恰是普通民众集体想象的本民族形象,期望出现一位能改变他们贫穷落后,提高他们福祉的人物,帮助他们扫除政治、经济、社会

① F. Sionil Jose. *Three Filipino Women*. Manila: Solidaridad Publishing House, 1999, p.38.

② F. Sionil Jose. *Three Filipino Women*. Manila: Solidaridad Publishing House, 1999, p.39.

③ F. Sionil Jose. *Three Filipino Women*. Manila: Solidaridad Publishing House, 1999, p.41.

等方面的污垢。

(二) 反思菲律宾政治生态

纳瑞塔受公公参议员雷耶斯潜移默化的影响,深谙菲律宾政要们的政治伎俩和操弄手段,同时,通过和美国政治精英的交往,她对美国的政治模式和政治运作也非常熟悉,因此开始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菲律宾的政治生态,更好地服务民众。随着她对美国的倦怠,她渴望回到马尼拉,进军政坛。她坦率地把自己的想法告知儿时伙伴埃迪,并对自己的“执政”方略进行了思考:

“现在真的是时候让更多有头脑的人登上我们的政坛了,而不是那种相互吹捧,贿票买票的老一套了。玛格赛赛自以为什么都懂,但事实上,他守旧又落伍,只不过是手法变成收买记者而已。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可以比他做得更细致严谨,如果你明白我所指的意思。我们应该经常地、不间断地进行民意调查,对民意进行量化分析,研判趋势。这些都是很复杂精细的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抛弃老一套的方法——枪炮,暗杀,贿赂,含沙射影,谎话连篇——爸爸所使用的那一套。你得承认,老人家的确很有手段……”^①

通过和美国政治人物的交往,纳瑞塔深知菲律宾即便已经独立建国,但在政治和经济等方面深受美国殖民影响,和美国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她渴望改变现状,发出内心的呼喊,“让更多有头脑的人登上我们的政坛了”,开展经常性、不间断的民意调查,深入民众,了解民众需求。显然,纳瑞塔渴望菲律宾政治上能够像美国一样,让有头脑的人执政,多了解民情,服务民众。但是现实是残酷的,要想改变腐败的政治生态不是一件容易之事。“有时,参议员雷耶斯会斥责他所属的精英阶层那伙人,因为他们没有为腐败的政治制度提供替代方案,从而削弱了国家的地位。然而,他的批评是温和且不严厉的,他们并非真想把国家这艘大船弄沉,甚至连晃动它的意图都没有。”^②既得利益政客参议员雷耶斯也深知菲律宾腐败的政治制度需要改变,但是并没有找到替代方案,其实他们并不想真正地改变现状。纳瑞塔

渴望改变这一现状,她组织自己的智囊团,期望为改变当时僵化的政治思维和方针政策做出创造性的贡献。

(三) 反思菲律宾经济生态

纳瑞塔组建了自己的智库团队。他们讨论菲律宾的经济改革,涉及农业改革、土地改革、消除贫困、水稻种植、烟草和棉花种植、渔业、旅游业,以及移民安置等问题。他们对诸多民生问题进行了思考,也对被美国牢牢控制的菲律宾制糖业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一问题纳瑞塔在美国时就认识到了,她对美国控制菲律宾的主要经济产业痛心疾首:

在地方层面,我意思是指内格罗斯省,我想废除那儿的制糖业。那是个殖民产业,它将我们与美国捆绑在一起。当然,除非我们放弃配额制度。^③

菲律宾的甘蔗种植和制糖业是美国的殖民产业。菲律宾的独特气候条件非常适合种植甘蔗,制糖业是菲律宾的支柱性产业之一,它的发展被牢牢控制在美国人手中。许多菲律宾政客也是依靠制糖业发家,参议长雷耶斯就是最大的受益者。纳瑞塔看清楚了这一点,因此她认为要摆脱美国的后殖民影响,必须让制糖业和美国脱离关系。她对埃迪说道,“我想废除那儿的制糖业。那是个殖民产业,它将我们与美国捆绑在一起”,显然纳瑞塔已经认识到美国殖民流毒对菲律宾政治经济等的影响,她渴望能够摆脱美国的控制,使菲律宾成为一个真正的独立国家。她认为要摆脱美国经济剥削,“除非我们放弃配额制度”。

(四) 反思菲律宾社会生态

城市治理全方位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国民素质和治理水平。小说对菲律宾城市问题进行了毫不掩饰的揭露,通过对美国城市的“异质形象”描写,镜像自我,反思问题。例如:

还有,就是脏!波士顿并不是美国最干净的城市——一位来自德克萨斯州的朋友说,休斯敦才是最干净的,然而和马尼拉主要街道比起来,波士顿是非常干净整洁的,至于马尼拉犄角旮旯里的小巷子,就更别提了。还有臭味,天哪,

①F. Sionil Jose. *Three Filipino Women*. Manila: Solidaridad Publishing House, 1999, p.37.

②F. Sionil Jose. *Three Filipino Women*. Manila: Solidaridad Publishing House, 1999, p.65.

③F. Sionil Jose. *Three Filipino Women*. Manila: Solidaridad Publishing House, 1999, p.38.

腐烂变质的恶臭、三角洲令人恶心的咸味,这些令人不快的气味像阴沉的季风一样笼罩着一切。^①

男主人公埃迪回到马尼拉,对马尼拉的城市卫生和美国波士顿的城市卫生进行了比较。马尼拉给人的印象是脏,到处弥漫着臭味,“腐烂变质的恶臭、三角洲令人恶心的咸味”,虽然波士顿不是美国最干净的城市,但是也比马尼拉强多了。何塞通过异域城市的美好环境镜像马尼拉的城市面貌。埃迪对马尼拉肮脏的城市产生了一种窒息感。这种窒息不仅仅是物理环境带来的窒息,也是当时的社会环境、政治环境带来人的窒息感。纳瑞塔把自己在美国学到的知识、与政治精英交往的经验带回菲律宾,期望改变菲律宾的社会生态,造福民众。她期望首先从道德层面上着手重塑社会。在和埃迪的谈论中,她明确了自己的观点,“我对文化也感兴趣。不局限于艺术层面,那太不上台面了。我感兴趣的是如何重塑我们的道德观”。重塑道德,这是一项社会文化工程。无论是改变社会的肮脏,还是改变思想的肮脏,都需要有正确的道德观,构建自己的社会文化体系,否则很难根除腐败的政治和社会制度。

结语

异质形象“镜像自我”是《珊瑚藤》的重要叙事艺术手段。作者通过不同人的叙事视角,把看似碎片化的异质形象进行拼接,实现虚幻与真实的有机杂糅,运用镜像效应反思自己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深刻批判美国的殖民造成了菲律宾的社会撕裂、政治腐败、人民贫困等严重的后果。作者在塑造异质形象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检视自我,促进自我形象的形成。作者每创造一个异族形象往往伴随着一个自我形象的确立。“塑造他者形象,是进行自我确认的重要手段”^②,何塞在《珊瑚藤》中通过不同人物的视角描写美国、中国及日本等异质形象,镜像菲律宾民族自我,对菲律宾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民众进行检视,期望能改变菲律宾的整体面貌。作者借助小说的隐含叙述人,以及作品中不同人物的语气、视角、态度、评价等主观因素反映菲律宾作为一个长期受殖民流毒影响的国家存在着政治、文化、“种族、阶级、性别等多种因素交织的权力关系与话语权的争夺”^③,期望能激发菲律宾民族意识和民族自醒,实现民族独立。

On Heteroimage and Self-mirroring in Literary Works:

A Case Study of Francisco Sionil Jose's *Cadena De Amor*

SUN Jianguang^{1,2}

(1. 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 Huaiy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uaian 223001, China;

2. Graduate School, Lyceum of the Philippines University, Cavite 4107, Philippines)

Abstract: The description of “heteroimage” in literary works not only meet the readers’ curiosity about the exotic, but also serves as an effective means for the author to mirror himself via “heteroimage”. *Cadena De Amor* is one of such works by the contemporary Filipino writer Francisco Sionil Jose. The author describes the “heteroimage” and “mirror self”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fferent characters. It deeply reflects over the politics, economy, social governances of the Philippines in the past, and provides readers with a panoramic picture of the Philippines in both the 1950s and 1960s.

Key words: Jose; *Cadena De Amor*; heteroimage; self mirror

(责任校对 葛丽萍)

①F. Sionil Jose. *Three Filipino Women*. Manila: Solidaridad Publishing House, 1999, p.45.

②刘洪涛:《对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几点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③张琪:《论多丽丝·莱辛的殖民地他者书写》,《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